
苏联经济核算制与中国计划经济

林超超

【摘要】经济核算制是苏联(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成熟的经营和管理企业的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政权从根据地时期就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核算制,但受限于主客观条件,经济核算制在中国始终未能得到切实落实。中国经济的非制度化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物力和人力损耗是计划经济难以实现资本大量良性积累的“短板”,中国计划经济的低效增长也源于此。

【关键词】苏联经验;经济核算;计划管理;鞍钢宪法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1—0162—11

【作者简介】林超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235

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走上了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道路。苏联在工业化建设中的高速度为这时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参照范本。对于急待实现经济恢复发展、向工业国转变的中国而言,指令性计划经济确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由中央政府统一指挥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有浓厚的集权倾向,因此,当1956年苏共中央出现政治变局,尤其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并引发东欧国家的社会动乱,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思考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以及中央高度集权的危害性。于是,就有了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反思与批判。毛泽东接连发表讲话“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①“大跃进”中对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的调整,正是这一反思的结果。

通常的说法是,新中国因为没有工业建设的经验而照搬苏联的成熟经验。但事实上,“照搬苏联经验”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中国在经济组织与制度建构上“照搬”了什么,更为关键的是,它究竟践行得如何,学界对此鲜有讨论,以至于在评价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负面性时,往往简单地以“照搬苏联经验”作为解释,甚至将“大跃进”的失败也全部归咎于照搬苏联经验的恶果。其间有许多被忽视的历史片段和被曲解的历史面相需要引起关注。近年来,也有学者为照搬苏联经验正名,如林毅夫认为“照搬苏联经验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②笔者在这里将更着重探讨照搬苏联经验的成效。为更好地诠释笔者的观点,本文将中国共产党政权从根据地时期就开始贯彻的经济核算制这一苏联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为核心,讨论社会主义中国对于苏联经验的借鉴及模仿成效。

一 学苏的起步:“走上经济核算时代”

1951年3月3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工业会议和财政会议的代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工作”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页。

^② 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1页。

的报告时指出“现在已不是供给制时代,而是要走上经济核算时代了。”^①“经济核算”这个词是从俄文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учёт* 翻译过来的,简单理解就是计算、统计、算经济账的意思,借此达到用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产出的经济效果。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经济核算制”(*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расчёт*),其内涵更加丰富。它的出现,源于苏联(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在缺少外部支援的情况下,苏联(俄)必须更加节约与合理地使用从国内积累的资本,同时需要更多的产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为了改变战时企业只管生产、不计成本、不算盈亏、收入支出都由国家包干的供给制,列宁提出,企业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学会估计和核算成本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盈利。因此,经济核算制也被认为是一种“不由政府贴补的企业经营和管理”。^②经济核算制的核心价值,就是唤起企业对生产业绩的关心,刺激其不断改善生产。为此,在企业与国家之间还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如计划、考核、奖惩等等。当然,要想使企业在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方面有持续发掘潜能的动力和积极性,企业必须有一定范围内处置其资产的自由,包括购买生产设备、原料等固定资材和处理其流动资金的自由,以及将大部分超额利润归入企业公积金和职工福利金,由企业自己掌握。^③以上几点,构成了经济核算制的核心要素。

1921年8月1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和1921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对苏联(俄)经济核算制的推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④此时,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基本单位主要是托拉斯和辛迪加,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苏联决定扩大经济核算制的适用范围,把经济核算制推广到所有企业当中,以保障计划任务按时甚或是提前和超额完成。经济核算制实际上成为苏联计划经济内部核心的管理方式。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编写的教科书中对经济核算制给出了这样的诠释:它是“社会主义企业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形式”,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工具”,“它表现在用货币来较量经济活动的消耗和成果,用企业本身的收入来抵偿支出,节约资金并保证生产赢利”,“企业的赢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它使社会可以得到不断迅速扩大生产所必需的积累”。^⑤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济核算制的借鉴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根据地时期。根据地公营工厂主要为供应军需,实行的是供给制(亦称报销制),不计盈亏。再加上技术条件低下,生产极不发达,许多工厂完不成每月的生产任务,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存在着不少质量问题。兵工厂生产的子弹打不响,枪支维修后运到前方仍不能使用;被服厂做的军衣不合尺寸,扣子一穿就掉;纺织厂的纱布稀密不均;粮秣厂加工出来的大米,有三分之一的糠。此外,原材料的浪费更加严重,中央印刷厂印一期《红色中华》浪费的油墨超过实际需要的一倍以上。还有大材小用、优材劣用,被服厂用几百匹高档的绸缎做军衣里衬。返工和浪费使得本就紧张的原料供应更是捉襟见肘,工厂时常因为材料短缺而停工。刘少奇认为,这是因为在公营工厂中“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工厂制度,没有科学地去组织生产”。如何科学地组织生产,一来,需要确立职权范围和劳动纪律,二来,需要制订生产计划,进行成本核算。^⑥

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于1934年4月10日颁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条例明确提出确立经济核算制,完成生产计划和减少成本费,是国有工厂管理的最大任务。^⑦1938年以后,根据地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42年12月,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再次作了说明:第一,每个工厂应有独立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第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137页。

② 朱志泰编《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制》,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3年版,第1页。

③ 布列格里《苏联经济核算制的本质》,松启仁、赵克成译,《国际经济》1949年第6期。

④ E. 勃列格里《苏联经济核算制度》,彭文华译,火星社1950年版,第5页。

⑤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39—541页。

⑥ 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斗争》第53期,1934年3月31日。

⑦ 《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红色中华》第175期,1934年4月14日。

每个工厂应有一定的收支制度;第三,每个工厂必须核算成本;第四,每个工厂应有计划检查制度;第五,每个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①此后,一些工厂开始改变供给制,一部分改为营业制。所谓营业制,已具有苏联经济核算制的雏形。实行营业制的工厂有相对独立的资金,能够较独立地开展经营活动,除了向主管部门上缴规定的产品和利润外,可以根据生产情况和市场需求生产其他产品。另有一部分工厂因产品专供主管机关自用不便改为营业制,而改为制造费制(亦称订货制),即由政府供给原材料,企业按照订货合同进行生产获得制造费的一种经营管理制度。制造费用中包含工资和一定的利润,使企业可以有相对独立的资金进行周转。营业制和制造费制较供给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同在制鞋的业余鞋厂因实行营业制,其产品质量要明显优于仍是供给制的新中国鞋厂和交通工厂。^②不过,囿于战争环境,物资供应尚不正常,实行供给制的工厂仍占多数。1948年以后,东北解放区的开辟,经济核算制才算有了一片成长的土壤。

一直以来,公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最大问题就是浪费严重,亟待改变“供给制传统”,代之以能够发展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③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在1949年7—10月间接连发布《关于加强经济核算制开展反对浪费斗争的决定》和《关于继续贯彻经济核算制的指示》,对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具体内容与步骤作了说明。与1940年代初相比,此时的说明有了一定变化,最显著的是,把开展群众性的创造新纪录运动与群众性的反浪费斗争放到了首位。这是因为,在过去一年的生产实践中,东北涌现出了赵国有、赵富有、党会安、陈济民、张尚举等大批先进生产者,把创造新纪录运动等群众运动发挥到了极致。^④相比制度层面的管理,中国的干部们更擅长通过群众性的生产动员达到增效降耗的目的。^⑤全国的情况则基本仿照东北例,同时也更加偏离苏联经济核算制的制度化,这其中既有主观上的排斥,也有客观上的阻力。

二 学苏的困境:难以企及的计划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东北解放区经验的基础上,中央要求各部门、各省市地方工业,参照东北人民政府有关经济核算决定的原则,有步骤地推行经济核算制,使企业减少浪费,实现盈利。时任中财委计划局局长的宋劭文不无尖锐地指出“最大的浪费在我们经济机关。……这种毛病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不计算”,总是“把政策放在前面,把计算放在后面,实行所谓政治领导”。他举例说,铁道部做修缮津浦路的预算,不问里程,只知木材可供应140万立方米,就把津浦路全长按14000公里计算,超过干线实际全长的十倍。^⑥经济核算制在1951年被正式纳入该年的财经工作重点,陈云讲得很明确“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搞的是‘供给制’,不是经济核算制,现在要改变。”^⑦在该年4月6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中,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尚未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国营企业,在今年内务必做好准备工作。^⑧

①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②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③ 《克服严重浪费和无组织状态,改善公营企业经营管理》,《人民日报》1948年7月29日,第1版。

④ 《加强经济核算制度反对生产浪费现象,东北工业部发布决定》,《人民日报》1949年8月3日,第2版;《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关于继续贯彻经济核算制的指示》,《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4日,第2版。

⑤ 林超超《生产线上的革命——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⑥ 宋劭文《关于财经工作的讲话》(1949年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

⑦ 陈云《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1951年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439页。

⑧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1951年4月6日政务院第79次政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51年4月30日,第1版。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第一步,1950年,东北国营企业已率先完成清产核资,整个过程历时8个多月。在此基础上,1951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向全国颁布了对国营企业进行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议,要求各地改变“心中无数”的状况,切实掌握各国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正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大小,企业内部建立独立的会计制并和银行建立结算制度,以便国家银行透过信贷、结算和货币管理,对企业实行资金监督。^①1952年年初,政务院继续发布了《国营企业提用企业奖励基金暂行办法》,规定完成清产核资的国营企业,在实现国家计划后,可申请提留不超过计划利润5%和超计划利润20%的企业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先进职工、补助困难职工、改进福利设施或生产设备等等。^②

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看,国家对于经济核算制的推进下了很大决心,有大刀阔斧之势,但这远远不够,关键还在制度的成效,而后者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予以保障。

首先,经济核算等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行仰赖于一定数量和业务素质的经济专业人员。由于经济工作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全国培养经济专业人才的专科、院校有限,既缺乏培育新生力量的教育,又无法对在职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③虽然有苏联专家来华指导,但中央各部委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不能很好地保证和监督相关干部和人员与苏联专家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对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处理,事先不与苏联专家充分研究,等到工作中发生错误,才去请教,临时交谈,随学随忘。不少干部还对苏联专家提出的问题不以为意,认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要求过高过严,一些重要的会议也无意不邀请苏联专家参加。^④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回忆,早在1951年年初,中财委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作了各种统计报表,但凭借各级统计机关和基层企业统计人员现有的业务能力很难完成填报,即使勉强上报,精准度也无法达标。无奈,报表只好一再简化。^⑤尽管如此,随着大规模的计划经济的开展,为满足激增的业务需求,基层企业不得不从产业工人中大量抽调人员,甚至一些炊事员都充斥到统计队伍中。^⑥因之,当华东局部署以建立经济核算制为基本要求的生产改革运动之时,着重强调发动群众性的劳动竞赛和工资改革,至于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实行独立会计制及建立责任制等,仅要求由领导上掌握,结合在运动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⑦

其次,于工作现场建立规范的原始记录制度是经济核算制有效运行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原始记录是按照一定表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每一次具体事实做的最初的记录,它既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客观写实,又是企业组织生产、挖掘潜力、制订先进定额^⑧、进行科学管理的重

①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第一步》,《人民日报》1951年6月4日,第1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定》,《人民日报》1951年6月4日,第1版;《国营企业资产清理及估价暂行办法》,《人民日报》1951年8月3日,第2版;《国营企业资金核定暂行办法》,《人民日报》1951年8月3日,第2版;《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会议确定国营企业当前中心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0日,第1版。

② 《国营企业提用企业奖励基金暂行办法》(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2年1月15日发布),《人民日报》1952年1月26日,第2版。

③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充分发挥经济专业人员作用如何调动其积极性问题的材料》,1963年,第42—43页,A38—2—66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与苏联顾问合作、向苏联顾问学习情况的检查报告》(1953年1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881页;《中央财政部一九五三年一至十月苏联专家工作检查报告》(1953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883—885页。

⑤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⑥ 陈鸣岐《优秀统计员——康积盛同志》,《统计工作通讯》1955年第1期;干无涉《从一个炊事员到工作有成就的统计员》,《统计工作通讯》1955年第3期。

⑦ 《谭震林同志关于上海第一批国营工厂组织劳动竞赛、进行生产改革的报告提纲》,《斗争》第151期,1952年6月20日。

⑧ 定额,指一定生产技术组织条件下,为完成一定量的产品所规定的劳动消耗标准量,可用产量定额或者工时定额来表示。参见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劳动法词典》编辑委员会编《劳动法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要依据。^①完善的原始记录制度是掌握生产情况、进行计划管理的凭据,也是经济核算的基础。生产组织和调度工作都需要通过详细的原始记录及时反馈,得到安排。同时,原始记录也为各种定额(如产量定额、工时定额、材料消耗定额)的制定和完成情况提供参照,以便通过定额的管理和修订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原始记录至关重要,但大多数企业内部的原始记录制度远不能达到经济核算和计划管理的要求。意识到原始记录在计划管理中的重要性,《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认真整顿原始记录工作》,批评现行企业制度对原始记录的忽视。^②在随后大范围的原始记录制度检查中,不少国营和军营企业都暴露出在原始记录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记录表式杂乱无章、前后不一;收交货点数不准、分批不清;退修件积压,疏于记录;工时、产量记录不实,造成定额不当;报送缺乏一定程序,送往各业务科的报表互相对不起来,以致原始记录不能及时、正确、全面地反映作业计划的完成情况,作业计划的编制与检查缺乏精确的资料,给计划管理以莫大的阻碍。^③与此同时,私营企业也被要求建立和完善原始记录制度。除了少数大厂,大部分的私营中小厂都没有一定的原始记录制度,只有一些简单的生产记录。1956年,上海市在私营纺织工业中组织了一次原始记录制度的整顿工作,从原料耗用、产量、次品、下脚记录和盘存制度等方面入手,逐一规范原始记录。^④直至60年代,且不论私营企业,就是在国营企业中原始记录少记、漏记、错记、字迹潦草等问题都一直没能得到根治。^⑤

再者,苏联经济核算制的最核心价值在于发挥企业自身的增产积极性和节约意识,实现盈利,不依靠国家贴补而生存,为此,国家需要赋予企业对其内部资源一定的自主支配权。1929年,苏共中央在推广经济核算制度的同时,颁布了调整生产管理和确立一长制(亦称厂长负责制)的决议。决议规定,在生产管理中,厂长(经理)对完成国家计划和一切生产任务直接负责,领导企业行政管理机构、全部生产组织和技术过程,并会同车间主任、工段长分别对工厂、车间、工段实行三级一长负责制,同时相应地建立各职能部门的岗位责任制。行政机构和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均应无条件地执行厂长(经理)有关生产业务的命令。^⑥之所以强调厂长对生产的领导权,是因为企业中还存在着一支党委系统,接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在供给制时期,他们是企业实质上的领导核心。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出发,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在生产中的职权与责任势在必行,但实行厂长负责制与否在中国被看作是一个权力问题。从根据地时期到老解放区,贯彻厂长负责制都是被反反复复提及的问题,可见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习惯于供给制和军事指挥,在工厂里政委是权力的核心,厂长对工厂的生产情况鲜少关心。1949年,苏联专家到北京石景山钢厂指导时,询问产品产量,陪同的厂长竟答不上来,让专家很惊讶,这在苏联是决不允许出现的。^⑦

此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扭转。在新解放区,政府一方面向企业派驻军代表、督导员或公方代表,完成企业所有权和生产决策权的转移,另一方面仍依靠原厂长和技术人员来维持生产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普遍采用党委制或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限制“旧厂长”和“旧人员”的权力。同时,企业的上级行政组织(部、局)都实行的是党委领导制,许多行政命令通过党委

① 陈元燮编《工业企业原始记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② 《认真整顿原始记录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6月4日,第1版。

③ 《国营第七三四厂关于基本生产车间整理原始记录工作总结》,1953年10月,第74页,A38—2—52,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共国营上海市第九棉纺织厂委员会关于纺部用棉量原始记录的检查报告》,1954年12月23日,第3页,A47—2—881,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整顿车间原始记录——上海市织布工业史料初稿(专题史)》,1957年2月12日,第23页,B193—1—23,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上海工业企业开展经济核算工作的情况汇报》,1963年3月15日,第146页,A38—2—66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⑥ 国营工业企业法调查组编《厂长负责制参考资料》,中国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7页《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在国营、地方国营工厂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与一长制的意见(草案)》,1954年,第28页,A38—2—84,上海市档案馆藏。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3页。

直接下达。在1951年华东局和华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虽有支持改行厂长负责制者,但也难以改变既成的事实。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当前这些地区仍缺乏“技术和政治都行”的干部出任企业高层核心,实施厂长负责制的条件尚不成熟,留待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后再行考虑。^①

1954年以后,考虑到企业当中已培养了一批新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般厂矿也多由党员干部担任厂长,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条件已经成熟,落实厂长负责制再度被提上议程。^②但是,根据上海市1954年试行一长制的情况反映,效果并不理想。许多厂长、科室主任遇事仍要找党委商量、拿主意,不敢独当一面。新中国的工业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生产组织,还承担了部分政治与社会职能,没有党、政、工、团的协调工作,单凭“一长”难以成事。^③“一长制”复议以来,仍然争议不断。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第三办公室关于厂矿领导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党组织必须把确立一长制作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④直到1956年,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一长制被彻底否定。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一些主张恢复“一长制”、指责党委书记包揽企业行政事务的人,都被斥以“反对党的领导”,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⑤

在中国共产党政权接管和改造城市工业的初期,党政干部对于群众(政治)运动的贯彻能力,要远高于经济制度建设的实践能力。相较于政治工作干部,中国缺少的是训练有序的执行计划管理的行政干部,这与苏联的情形正好相反。^⑥后来强调“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是有它的现实基础的。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当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被纳入到计划体制,国家更没有能力及时推进经济核算等制度建设,从制度上确保生产的高效运作,反而是将群众运动发展到了极致,这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

三 学苏的中止“大跃进”的背离

1958年以后,国家除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将部分工业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地方与中央二八分成,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现生产“大跃进”;在企业内部,也在进行着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变革。在1956年11月15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借由“匈牙利事件”谈到国内形势,他把群众的不满和抗议与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联系到了一起。^⑦1957年,中央在发出开展整风运动指示的同时,下达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⑧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指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工作,与工人建立平等关系。就在这份条例中,刘少奇代为起草了一个关于制订和修改规章制度的条文,提出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修改或废除那些束缚生产力、阻碍群众发挥积极性的“陈规陋章”,建立新的合理的

①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7页;《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转发孙治方“有关厂长负责制问题致潘汉年的信”的通知》,1954年8月2日,第30—32页,A38—2—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1954年4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9页。

③ 《国棉十九厂党委关于推行一长制的初步总结》,1954年6月5日,第41页,A38—2—66,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共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委员会关于贯彻一长制初步情况报告》,1954年4月5日,第55页,A47—2—89,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第三办公室关于厂矿领导问题座谈会的报告》(1955年10月2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63、980页。

⑥ 华尔德(Andrew G. Walder):《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4年版,第127页。

⑦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战士读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版,第1062页。

⑧ 《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第1版。

规章制度。^①

黑龙江省率先总结了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齐齐哈尔市建华机械厂等工厂的生产制度改革经验上报,并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这一经验被概括为“两参一改”,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实践热潮,逐渐发展出“两参一改三结合”(三结合指技术人员、工人与干部三结合)的正式表述。^②到了1960年,毛泽东对这种有别于苏联企业的管理办法有了更加明确的概括。在批示鞍山市委的工作报告时,他欣喜地表示“鞍钢……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还包括了大搞群众运动、实行政治挂帅、党委领导制和开展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有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所谓“马钢宪法”指的是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生产管理方式,此时被作为“一长制”“专家治厂”“繁琐制度”的典型代表。^③

实行“干部参加劳动”之后,科室和车间干部都要有一半工作时间内下车间参加生产,管理工作几乎无暇顾及,而“工人参加管理”之后首先提出的也是简化手续、突破“陈规陋章”。^④但何为束缚生产力的“陈规陋章”,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加以判定,事实往往是“谁感到什么制度不顺眼,谁就可以宣布它束缚了生产力而不加遵守,以致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掉地契那样烧毁”。^⑤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在几天内接连废除和简化了260余种报表,修改制度150余项。^⑥同样作为典型的齐齐哈尔市建华机械厂标榜“八无”制度,即无人售饭菜食堂、无人发放工资、无人管理工具库、无人管理图书室、无人管理游艺室、无人收会费、无人收售电影票、无人收售洗澡票。^⑦

工人们向来不喜欢受约束,废除“管人”的规章制度总是能够得到他们的积极拥护。庆华工具厂的工人把业务改革视作“炸碉堡”,第一座“碉堡”就是工人们普遍反感的一料一票的“限额发料”制度。以减少核算票据的工作量和时间为名,工人们要求增加每次领料的数量,减少领料次数,将某些小型材料改为月初一次领料。第二座“碉堡”也是和工人息息相关的工资核算和发放制度,工人们要求当月工资当月结算。^⑧对于干部们来说,在“大跃进”高指标的压力之下,他们早已失去了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的信心,权力下放实际上也是责任下放;放手发动工人或许还能有些希望,即使不成功,也不至于背负“官僚主义”或是“保守主义”的罪名。

这股改革的劲风不久也吹到了上海。在全民整风、“大鸣大放”的势头下,各厂党政领导、科室干部普遍下厂跟班劳动,搞“试验田”,抓一个关键产品、关键单位或关键问题创造“经验”。^⑨上海第二钢铁厂是党委书记、厂长、总工程师跟常日班(一班制),副厂长、科室主任、工会主席跟中班(三班制);车间主任跟常日班,支部书记跟中班,生产副主任跟夜班。^⑩上钢三厂不仅厂级领导跟班

①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50页。

② 《中共中央批转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195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84页;中共黑龙江省国营庆华工具厂委员会《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和业务改革经验的初步总结》,《人民日报》1958年4月25日,第3版《企业管理的重大改革,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王鹤峰同志在省工业干部现场会议上的总结》,《人民日报》1958年4月26日,第3版。

③ 毛泽东《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196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2页。

④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和推行庆华工具厂经验的通知》(1958年4月1日),《工业交通工作通讯》1958年增刊第1期。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967页。

⑥ 《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人民日报》1958年5月7日,第1版。

⑦ 《共产主义精神蓬勃发展,建华机械厂实行“八无”新制度》,《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第3版。

⑧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和推行庆华工具厂经验的通知》(1958年4月1日),《工业交通工作通讯》1958年增刊第1期。

⑨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著《整风运动中上海工业企业管理的重大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⑩ 《上钢二厂跟班参加劳动情况小结》,1958年3月27日,第19页,A46—2—30,上海市档案馆藏。

督产,党政中层干部到关键车间任职,177名技职干部也被发往生产一线。^①上海烟草四厂在机构组织上大动手术,取消了车间,改为两个大生产班,由副厂长亲自指挥。每个大班分4个工段,设4个脱产工段长。党的组织由3个车间支部改为8个工段支部,支部书记不脱产。厂级14个科室合并成为两个科,原有科室骨干下放加强工段和支部的领导,一般科室干部下放参加劳动生产,从而将脱产干部由244人减为71人。^②

干部下厂之后,行政管理权也跟着下放,不少规章制度名存实亡。上钢三厂撤销了检查科,放钢和浇钢签证制度、违反规程考核制度、炼钢和浇钢监督规程等先后被废除,其他诸如炼钢和浇钢操作规程、平炉护炉制度、配料制度、成品检验制度等虽未“宣判死刑”,却也“朝不保夕”。^③求新造船厂仿照庆华工具厂取消了“限额发料”制度,结果两条同样规格的船,一条领用的钢材是200多吨,一条是20多吨,相差过甚,成本核算根本无法落实。^④江南造船厂工人提出打倒派工单(派工单是计算工资、奖励的依据),领导上不得不接受工人们的意见,改由工段长直接分配活计。^⑤上海柴油机厂原来每日每班的计划均由科室安排,加工按图纸,工艺按规定,学习庆华工具厂“两参一改”经验以来,生产计划、调度、定额、考勤、工资统计、工具管理等等全都下放给生产小组掌握和管理。^⑥有些企业把生产计划、产品设计、技术检验、技术安全、设备动力、工艺等重要科室都给裁撤了。行政干部权力的萎缩,也将“党委领导制”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企业是党委书记一人包办、独断专权,有人管这叫“书记一长制”;有的企业实行的是党总支或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科室主任负责制,党委会已然成为生产指挥部。^⑦

“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对企业内部在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并不完善的既有制度的彻底颠覆,因此有学者赞誉其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是对福特式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科层分工理论的挑战,认为“鞍钢宪法”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已有学者著文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事实恐怕不允许我们对“鞍钢宪法”给出较高的评价。^⑧“大跃进”以来,工厂上下工序之间、生产和验收人员之间的程序和凭证记录大为减少,表面上说提高了生产组织效率,但由于缺少经济核算造成的成本激增,以及质量下降、机器损坏等现象非常严重。上钢三厂全厂钢品的一级品率从1958年的81.66%下降到1960年的63.64%,平炉车间每吨钢的成本由1957年的不到246元上升到1960年的352元,转炉车间的成本更是飙升了206元。仅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全厂亏损就达10294万元之多。^⑨

中央工业工作部上海工作组对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情况,也反映了几个突出问题:第一,产品质量大幅下降。工作组抽查的10台机床均发现有零件漏装、错装、精度不合标准等情况,主要原因是技术检查制度松动,一部分检查人员被下放生产,疏于专职检查。第二,工人为图省时任意违反操作规程,过分简化设计图纸和工艺规程。铸工车间在5月产出的779吨废品中,由于工人违法操作规程而报废的占56%左右。工艺规程规定浇铸磨床床身要静止6个小时,但工人仅等待了3小时就迫不及待开箱,结果五六只床身因此裂开报废。第三,设备损坏严重。据液压车间统计,全车间104台机床中,因损坏需进行修理的就有51台,占全部机床的48%。设备损坏一方面是由于机床

① 徐仁秋、陈崇武主编《三钢人的足迹——上海第三钢铁厂发展史(1913—198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② 中央工业工作部上海工作组《上海烟草四厂改革机构,厂长跟班领导生产》,《工业交通工作通讯》1958年第7期。

③ 徐仁秋、陈崇武主编《三钢人的足迹——上海第三钢铁厂发展史(1913—1989)》,第50页。

④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向华东局、国家经委关于上海市工业企业讨论和试行工业七十条的情况》,1962年1月25日,第5页, A36—1—243,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中央工业工作部上海工作组《革掉陈规旧律,生产面貌一新》,《工业交通工作通讯》1958年第8期。

⑥ 中共上海柴油机厂委员会《依靠群众改革企业管理制度》,《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7日,第2版。

⑦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15—716、964页。

⑧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8月号;高华《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4月号。

⑨ 徐仁秋、陈崇武主编《三钢人的足迹——上海第三钢铁厂发展史(1913—1989)》,第50—51页。

长期超负荷运转,没有间歇,加重了磨损程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维修制度被废止,以致该修的不修,“小病变成大病”。第四,停止了不少原始记录,如停工工时、设备修理工时、废品单等,无法准确反映实际工时,纵容了工时记录中的虚假瞒报。^①工作强度的增长和管理上的松懈还导致生产事故频频发生,上钢二厂在“大跃进”中,线材车间的事故率增加了一倍以上,开坯车间通过拼体力创造生产记录,隔日就有12人因过度操劳病倒,此后一连三天连跃进前的计划都完不成。^②

四 学苏的重启:再提经济核算

“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对“鞍钢宪法”的推崇,许多规章制度被冲破了。从1960年底开始,中央开始针对工业生产中出现的计划与制度管理失序,到企业中进行调查研究。李富春带领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市委等一行人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展开工作;随后,国家计委、经委率队到石景山钢铁公司等企业继续调研;薄一波在京主持了有各中央局经委主任和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江苏等11个省市主管工业的党委书记在场的座谈会。上海方面,市委工业工作部拟订了《工业调查提纲》,组织4个调查组,分别到南洋电机厂、上海化工厂、第一汽车附件厂和诚孚铁工厂进行专题调查,同时,由区委书记和工业局局长组成的调查组也深入到多家工厂实地考察。以上调查组前后历时5个月,分15个专题,撰写出了92份调查报告。1961年5、6月间,各地的调查报告和座谈材料陆续反映到中央。6月以后,薄一波受命组织一班人马赴沈阳调研并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9月,成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中央讨论通过,下发各地。这份工作条例的基本内容都是针对当时工业企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出的相应规定,要求重新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专职机构和专职人员的责任制。条例还重新强调了经济核算的重要性,要求企业编制成本计划,加强定额管理,实行厂部、车间、小组三级经济核算。

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在条例下达后,很快行动。在首批36个工厂干部讨论学习条例后,至10月中旬,学习条例的工厂扩大到2200多个。11月下旬,市委召开《工业七十条》试点厂的经验交流会,由先行试点的上海电机厂、第一缝纫机厂和杨树浦发电厂介绍经验,并进一步确定22个工厂企业作为下一批试点单位。1962年4月15日至28日,国家经委工作组和华东局经委在上海共同召开了华东地区企业整顿工作会议,指示华东地区在今后两年继续对所有企业进行一次整顿,从根本上消除管理混乱、质量不稳、亏损严重等现象。

上海市随即提出了《1962年上海市工业企业贯彻七十条的打算》,清产(仓)核资、建立经济核算制再度启动。各工业局除重新确定了64个试点单位,派出工作组常驻蹲点或指定专人联系,还对列入第一批开展整顿工作的600多家企业进行了初步摸底,确定有的企业着重进行清产核资,有的结合精简工作解决“二定”(定人员、定机构)问题,有的全面查定生产能力,还有的以加强技术管理为主。^③全国范围内的清产核资工作大约从1962年4月开始至1963年第一季度基本结束,第二季度以后转入对积压物资的收购处理、调剂使用和维护保管。据统计,全国清查积压物资总价值超过173亿元。^④1962年核资后,上海8个主要工业局所属企业每100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12.42

① 《中央工业工作部上海工作组:上海机床厂改革规章制度的调查报告》,《工业交通工作通讯》1959年第16期;《整顿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向上海市委的报告),《工业交通工作通讯》1959年第23期。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17页;《中央批转中央工业部关于目前企业管理工作中的若干情况和问题的报告》(1959年6月1日),《工业交通工作通讯》1959年第17期;工人出版社编《厂矿企业开展技术革命的初步经验》,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113页。

③ 沈逸静《〈工业七十条〉在上海的贯彻》,徐建刚主编、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艰难探索:1956—196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46、350—351页。

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清仓核资领导小组〈关于结束清仓核资工作的请示报告〉》(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9页。

元,比1961年降低2.57元,可比产品成本比1961年下降6.84%。^①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经济核算继续推进,冶金、机电企业重新制定或修订了原材料、辅助材料、动力、劳动工时与资金等定额;纺织企业着重抓用棉、用纱、煤电等消耗定额;轻工业企业则主要抓储备资金和用料、用工定额。^②

至1963年4月,国家经济委员会仍在组织召开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继续讨论如何加强企业经济核算,推动企业不断降低成本,实现扭亏为盈。^③同年9月,国家经委制订了《关于工业、交通、建筑安装企业经济核算制条例(草案)》。条例开门见山地指出“经济核算是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根本原则。……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才能)促使企业生产和技术的不断改善,厉行节约,充分发掘和合理利用内部的潜在力量,以最少的人力和物力,用最少的资金,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④

一系列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的指示,让人感受到经济工作正逐步受到重视。^⑤然而就在此时,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开始。1964年下半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阶级斗争”重新提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上到工业主管部门下到企业基层干部对于《工业七十条》和经济核算制的贯彻执行显得愈来愈力不从心。国家经济主管部门虽已考虑修订甚或是重写《工业七十条》,有意增加一些政治上的修饰语,但修订稿未及颁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很快将《工业七十条》送上了审判台。《工业七十条》被斥责为走修正主义路线,公然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相对立。^⑥制度管理被等同于“管、卡、压”,经济核算被等同于“利润挂帅”,也遭到批判。工厂里的干部表示“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抓经济核算险上加险。”^⑦“突出政治”“政治挂帅”被视为最稳妥的选择。与此同时,有关“鞍钢宪法”的公开报道越来越多。《工业七十条》并未明确反对“鞍钢宪法”,但与后者之间的抵牾显而易见,事实上,条例自颁行伊始就遭到了非议,矛头直指其对“大跃进”的明褒实贬。^⑧

结 语

本文虽主要以上海为个案,但由此得出的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特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从全国范围看,除了东北地区得到苏联的重点援助,情况较为特殊之外,全国其他地区从计划体制建立之初,就对苏联模式中的制度化、管理化多有排斥。上海作为全国工业化、外资经营活动起步较早,劳动者素质较高的沿海城市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形可以想见。1949年之时,对于一个年轻的新中国而言,彼时的苏联如何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之下把一个残破不堪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先进工业国,又如何把一个私有经济占相当大比重的国家,改造成为一个生产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其中的经验都是何等的宝贵。新中国选择学习苏联经验,并不难理解。但是,在包括经济核算制在内的计划经济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始终没有严格执行、切实落实,中国的干部们更倾向于使用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以达到增产降耗的经济效果。群众动员在一个普通劳动力富余而资金和技术相对贫乏的国家,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因此被看作是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②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上海工业企业开展经济核算工作的情况汇报》,1963年3月15日,第17—19页,A38—2—66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③ 《国家经济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下发“企业经济工作调查研究提纲”的通知》,1963年2月1日,第1—2页,A38—2—66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工业、交通、建筑安装企业经济核算制条例(草案)》,1963年9月27日,第63页,A38—2—659,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充分发挥经济专业人员作用如何调动其积极性问题的材料》,1963年,第42—43页,A38—2—66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⑥ 《上海工业战线革命派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人民日报》1967年7月3日,第3版;《以毛泽东思想为强大武器,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在各方面的修正主义流毒》,《人民日报》1967年7月17日,第3版。

⑦ 《加强党的领导,搞好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上海吴淞化工厂的调查报告》,《文汇报》1972年3月28日,第1版。

⑧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957—958页。

中国工业大跃进中的一项“制胜法宝”。当“大跃进”的受挫暴露了群众运动的负面性,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制度化建设再度引起重视,《工业七十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有关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绩效,高增长、低效益是一个共识,相较于“三年跃进”和“十年文革”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近乎灾难性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以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2—1965)的中国经济态势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到,强调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的负面作用是学界在解释中国计划经济低效问题时的主要观点。这其中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左”倾思想导致所有制成分单一、经济增长盲目求快、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也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经济组织及生产活动的干扰与破坏,亦有政策性投资(如“三线”建设)对于经济成本的忽视。^①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便在公认的经济效益较好的“一五”计划时期,比之于同时期的邻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低效也表露无遗。^②举例来说,从1950年到1975年,中国国内基本建设投资超过5000亿元,但形成的固定资产不到3500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8.4%,也即是说有将近1/3的投资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或投资效果不佳,这个数字要低于同期苏联20%以上。^③

考虑到这一点,一些学者开始就中国计划体制本身寻找问题,强调中国计划管理的“非理性”“随意性”“非科学化”,或者说它根本就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国家在计划管理上的乏力,导致“宏观多变”,同时又把“微观管死”。计划体制对微观经济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的激励不足也是中国的计划经济被诟病最多的一个体制内缺陷。^④毋庸置疑,以上现象的确存在,但国家并非毫不知情,更未置若罔闻,笔者认为增产节约运动、反浪费斗争、反对官僚主义乃至劳动竞赛等国家动员都应该被看作是国家实施经济监督、弥补激励不足的一种表现。中国的计划经济亦有其效率考量和激励机制,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计划经济的低效增长恐怕也部分源自于此。非制度化管理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物力和人力损耗,是计划经济难以成功实现资本大量良性积累的“短板”。社会主义经济也好,资本主义经济也罢,在严格核算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方面是没有差别的。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级身份与上海工人的物质生活研究(1949—1965)”(项目编号:14CZS02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杜倩)

①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董辅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594—596页;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② 秦晖《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 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编《1989中国投资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页。

④ 秦晖《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董志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westerners , and proposed many creative ideas.

Dialogue Model between Islamism and Catholicism in China: A New Research on “Confrontation on Rationality” (“据理质证”) **XIAO Qing – he , WEN Ying – jie**

In 1865 , when MA De – xin (1794 – 1874) , the leader of Yunnan Muslims , read the Catholic writings “Discussing on Learning in Sanshan ” and “Self – Arguments on the True Way ” , which were presented by Jean Joseph Fenouil (1821 – 1907) who was a Priest of Yunnan Diocese , he wrote two letters to express his understandings and incredulities. Then , MA published the letters as a book named “Confrontation on Rationality ” so as to disclose the first case between Islamism and Catholicism. He was well known as the first man of dialogue between Islam and Catholic in modern China. It may be helpful to religious dialogues in China today.

A Study on CHENG Bing – zhao ’ s Biography and Writings **ZHANG Zhen – guo**

CHENG Bing – zhao was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o was born in Jixi. He gained the respect of XU Shi – chang , CAI Yuan – pei and HU Shi. According to his manuscript such as “The Anthology of Gongxue Zhai ” , we can deduce that he was born in 1838. There are quite a few manuscripts preserved in the world besides his woodblock works “The poems in Qiongzhou ”. The original author of some novels which compiled by WANG Tao was CHENG Bing – zhao.

On the Marginalized Position of Guangzhou Wan in French Indo – China **GUO Li – na**

Due to the weakness of its connection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with French Indo – China , Guangzhou wan was not included in its plan of colonial development. The Hanoi government even intentionally had this leased territory marginalized because of the opium smuggling. However , based up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French colonization in East Asia , Guangzhou wan served strategically for power balancing first , then the economic needs of the federal Indo – China.

University Unrest in Post – revolution Atmosphere: on the Expelling of University Principal in Datong University **YAN Hai – jian**

The university principal Hu Dunfu of Datong University was expelled in the political unrest in 1927. The KMT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break the established authority of the education world to enforce their control over the university. However , due to their own condition , universities kept considerate independence. In this sense ,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ower had an influence of both breakup and continuation.

British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KMT Blockade of Shanghai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and the Causes of its Formation **MA Ding**

After PLA liberated Shanghai , Kuomintang utilized his remaining maritime and air supremacy to blockade Shanghai for almost one year. While aggravating the hardship of Shanghai residents ’ living , it also brought great damage to British interest in Shanghai. British authority refused to admit the blockade and tried to break it. However , due to Kuomintang ’ s obstruction and American ’ s indifference , British authority did not achieve its goal. Thus ,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local British enterprise and the moral of local British community were badly damaged.

Soviet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and China ’ s Planned Economy **LIN Chao – cha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mitated Soviet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from the revolutionary base. However , the system was never really carried out in China. The non –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of China ’ s economy brought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physical and human losses. It became the short plank of China ’ s planned economy , restricted healthy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a grand scale and led to low

efficiency.

The Western Exped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1869 ~ 1872) **GAO Ke**

As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went on in the mid – late 1900s ,fantastic views in Yellowstone were discovered gradually. In order to prevent private dwellers from taking it as personal possessions , some American social elites put forward a proposal that the headstreams of Yellowstone could be preserved as a public park. The Yellowstone Act was passed in congress in 1872 ,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park in the world. It established a principle of public welfare and a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protectiv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Coloni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the Rise of Protest in Rural Africa: Focusing on the British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1940 – 1960) **LI Peng – tao , HUANG Jin – kuan**

In the 1940s ,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in British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had realize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and soil erosion in African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stimula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tabilize the rural society , they launched a serie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However , these projects had not effectively stabilized but provoked the protest of rural society , which made peasants the alliance of African nationalists.

The Thai – American Negotiations on Dispatching Thai Troops to South Vietnam from 1964 to 1967 **WU Hao**

The Thai – American negotiations on dispatching Thai troops to South Vietnam were carried on from 1964 to 1967. Being concerned that it might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ooperation in other more important fields ,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didn’ t make a formal request to Thailand until the Thai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decision to send a combat unit to Vietnam in early 1967 initiatively. In fact , Thai government would not like to send troops to Vietnam until its security continually deteriorated after 1965. It revealed a complex character of the Thai – American alliance.

Finding “Printing Capitalism” in China—commenting on Gutenberg in Shanghai: Development of Capital of Printing Industry (1876 – 1937) in China **ZHOU M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Gutenberg in Shanghai by Christopher Reed was finally published in 2014 , providing great convenience for u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book. The book redefined printing capitalism and attempted to probe into the conditions and presentation of it in China. It also pointed out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hinese printing tradition upon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printing. Christopher Reed’ s ideas offered helpful reference to re – understanding issues lik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modernity , etc.

Review of Study on Rural Labor Force in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eriod of China

WEN Wen

The rural study on Mao’ s era presents a tendency of localization , the peasants’ situation also attracted scholars’ attention. Research on rural labor force of 1950 – 1970’ s China has accumulated plenty of achievements. In the discussion of labor mobilization , researchers attempt to analyze it from three aspects – government’ s control , organization and pragmatic economic stimulus policy. Some researchers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s labor force cooperation policy was successful , some don’ t think so.

(葛鉴瑶 译)